东部沿海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当年曾以一个小渔村——深圳的崛起为代表，创造了风靡全国的“深圳速度”。如今，30年多年过去了，伴随劳动力、土地成本的上升，大量产业从沿海向东南亚国家和国内中部地区的转移。当大家感叹东部优势渐逝、中西部后来居上之时，沿海地区再展雄风，加紧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特别是深圳正全力打造创新驱动型经济，引领“中国制造”成长为“中国智造”，并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冲刺。

沿海开放

创新效应溢全球

本报记者　罗　兰

西部赶超　风水轮流转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东部沿海率先掀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那时，大量外资蜂拥而至，外向型经济异军突起，先进技术与科学经营管理层出不穷，加工贸易产品远销海外。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百姓生活富裕，其繁荣的景象令全国羡慕，更是各地学习的榜样。

之后，东部沿海的开放效应不断向内地扩散，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经济区域板块，促成了全国全方面、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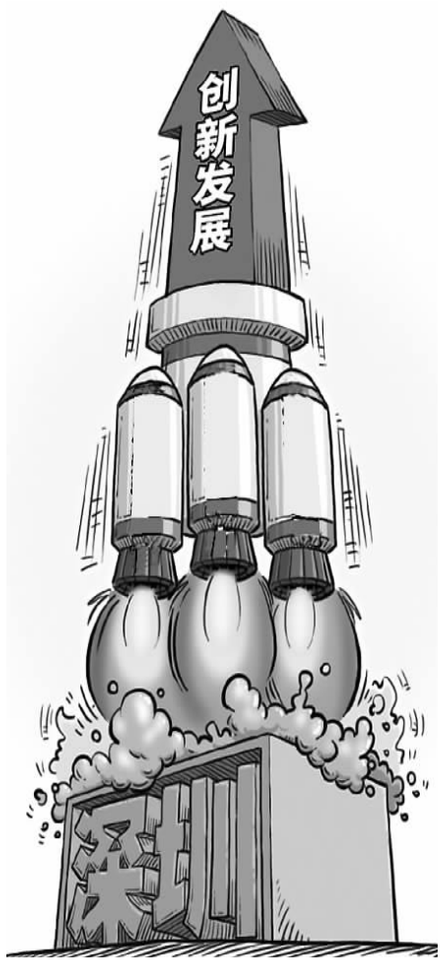
世事无常，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东部沿海当年快速发展的动因也在削弱。从外部因素看，进入新世纪后，欧美发达经济体不断陷入危机，需求减弱，以欧美发达经济体经济为主要开放对象的东部沿海地区也随之放慢了脚步；从内部因素看，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渐失。

2007年，长期以来“东快西慢”的区域增长格局发生重大转变。据统计，当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东部，从2008年开始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全面超过东部。东部10省市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在2006年达到55.6%的峰值后逐年下降，到2014年已降至51.2%。

根据各地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2016年4月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出现了整体放缓的趋势。而中西部和东北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据统计，4月份，西部、东北和中部工业的发展均有所加快。

产业转移　水往低处流

伴随要素成本上升，东部沿海地区的很多产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2013年商务部有关课题组发布的报告称，我国沿海地区传统产业（纺织、服装、鞋类、箱包、家具、玩具、塑料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以核心制造环节与上下游配套企业同步转移为主，进入了全面优化产业链布局的新阶段。这次产业转移，呈现出以国内转移为主、境外转移起步发力，产业布局优化、生产转型与投资转移并举等特点。



新华社发

区增长快、中西部地区增长较慢，东部、中西部地区增长都较快，中西部地区的增长快于东部地区。报告分析，第一个时期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东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基础和条件较好、承接外部产业转移的能力较强、有承接空间有关；第二个时期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增强、东部地区仍有承接国外产业转移的优势有关；第三个时期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动能减弱、东部地区向外转移产业的动力减弱和空间收窄有关。

国家对产业转移工作非常重视。据悉，目前相关部门正在酝酿中西部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一揽子鼓励政策，引导加工贸易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转向中西部地区。

上图：深圳市首届工业机器人设计与管理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深圳大学举行。　王雨渤摄

在2016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与会者在中国华为公司展台体验虚拟现实设备。　新华社记者　张帆摄

如今，越来越多世界500强企业落户中西部，国内许多知名品牌也转战内陆。而有着近3万家加工贸易企业的广东从2011年起就已经启动了新一轮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截至2015年，珠三角地区转入粤东西北地区的加工贸易项目累计达779个，陆续向中西部转移加工贸易产能近400亿美元。

社科院有关报告指出，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间的发展格局，出现过三个不同的时期，即东部地

创新驱动　涅槃后重生

产业转移是否会造成沿海地区产业空心化？是否会使经济发展停滞？对此，专家指出，没有必要过分担心。短期看，产业转移会带来一定的阵痛：就业下滑、税收下降等；长期看，却是东部地区“腾笼换鸟”、释放要素、优化资源配置的必然过程，有利于企业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研发、创新等，在全球产业分工中迈向更高端。

事实上，目前主要转移出去的是第二产业——制造业，这为东部地区发展现代服务业，进行产业创新，从比较粗放的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方向转型提供了新机遇。曾经创造经济高速发展奇迹的深圳，目前正品尝着创新带来的甜头。

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许勤介绍说，在世界经济面临寒冬的时候，我们提倡要冬训，迎接春天的比赛。他表示，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2008年底，深圳把互联网产业、生物技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确定为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培育和打造，陆续制定了3个规划和3个产业政策，连续7年每年每个产业投入5亿元支持发展。

“我们确定的第二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生物技术产业。在生物技术领域，深圳一是建设基础设施，二是建设实验室，三是支持研发机构、大学和企业，在一些新兴领域中取得突破。之后，我们又陆续将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予以大力支持。”许勤说。

面对转型升级，深圳用创新做好了准备。据统计，到2012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步入正轨，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0%左右，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引擎。目前，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的近五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总规模达2.3万亿元。

中国智造　墙外也开花

2015年，深圳平均每天创造46件发明专利，这种火热的创新实践赋予了“中国制造”更高的科技含量，更高的附加值，使“中国制造”提升为“中国智造”，受到世界欢迎。

打开深圳企业的“全球版图”可以看到，创新外溢效应明显：2015年，华为手机热销70多个国家，业务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世界1/3以上的人口；总部位于深圳的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产品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收入50%来自国际市场；比亚迪公司2015年全球销售新能源车超过6.1万台，以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11%的优势排名全球新能源车年度销量第一；华大基因研究院在全球顶级学术期刊发表研究文章200多篇，全球学术影响力排87位，贡献了世界基因测序数据的50%，农业基因数据的70%；深圳市大疆创新是全球飞行影像系统先驱，顶尖无人机飞控系统研发和生产商，率先开拓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产品占据全球50%以上市场份额。

当前，深圳正努力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一流科技产业创新中心迈进。为实现这个目标，许勤介绍说，深圳大力推进开放式创新，加速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集聚全球创新资源和能量，支持创新龙头企业走出去，在科技资源密集的国家和地区设立研发中心，积极承接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向深圳转移，鼓励跨国公司在深圳设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机构和科技服务机构。

“深圳为打造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会付出100%的努力。”许勤表示，深圳将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大力引进培养人才、完善各方面配套政策、提高国际化程度等方面进一步努力，大力推进开放式国际化创新，支持创新龙头企业走出去，吸取全球创新能量，提升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和能级。（**压题照片据网络资料**）

超越转型升级的阵痛

孙玉麟

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地区。在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经济实力迅速提高，为增强我国综合实力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该地区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弱化，将继续承担我国国际竞争力提升和国内经济发展示范的重要作用。

虽然东南沿海面临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能源缺口较大、耕地流失严重、产业发展空间受限、生态环境恶化、生产成本剧增等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但综合考量，东南沿海仍具有明显的综合比较优势。一是有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和较强的制造能力；二是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和较高素质的产业工人；三是有一批具有创新意识的优秀企业家和较强创新能力的龙头企业。而这些龙头企业带动着整个产业链的转型升级。例如，位于深圳龙华梅观高速公路两旁的华为和富士康，在珠三角地区就拥有数千家上游产业链企业就达数千家。

国务院近日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通过“三步走”实现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战略目标。这份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系统路线图的实施，将极大地激发各类主体参与创新的积极性，加速从科技成果到市场产品的转化。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尤其对处于转型升级阵痛中的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如今，走进深圳，大企业、中小企业都在轰轰烈烈搞创新，源头式、颠覆式、引领式，各种创新让人眼花缭乱。与创新能力相对应的是科技投入和有效产出。在改革初期，中央提出企业要成为技术开发和科技投入的主体。这在深圳已变为现实：90%以上研发机构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在企业，90%以上发明专利出自企业；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4.05%，世界范围内只有以色列和韩国超过4%。

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创新就是将各种要素形成一种新的组合，带到生产体系中，变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随着第一代企业领导人半数以上将步入退休年龄，许多民营企业在代际传承和基业长青方面进行着有益的探索，沿海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例如，方太集团用20年的时间，由一个初创企业成长为国内厨电行业的佼佼者。与此同时，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方太集团创办了家业长青接班人学院，致力于家族企业百年传承。

笔者相信，经过多年来严酷市场经济环境锤炼的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和高素质专业技能人才，必将肩负起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历史重任，成功推动沿海地区经济的转型升级和持续增长。

开放谈

截至2015年底，比亚迪新能源汽车足迹遍布全球五大洲43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190多个不同的城市。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自贸区创新亮点多

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近来发布的《2016中国自贸实验区发展报告》认为，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四个自贸区解决了诸多市场扩大开放后和自贸区发展中的新问题。

调研发现，四个自贸区在负面清单投资管理、商事制度改革、贸易便利化等方面的先行先试措施效果明显、亮点频现，具体体现在：负面清单投资管理模式不断升级，商事制度创新进入整体探索，以“互联网＋”提升贸易便利化，基于信用体系强化监管风险防控等。

在这些创新探索中，部分属于中央事权，其他地区需要得到国务院或相关部委授权才能复制，但也有部分属于地方事权，其他地区可直接借鉴。

与此同时，四个自贸区还从各自实际出发，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总体方案及进一步深化上海自贸区改革开放方案的要求寻求差异化发展。上海自贸区在继续担当多项先行先试领头羊的同时，重点探索金融改革和创新；广东、天津和福建自贸区则分别利用区位优势，立足推动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出台各种创新举措，取得了初步成效。

四个自贸区打造的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获得企业的普遍认可。在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对四个自贸区149家企业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多数被调查企业对自贸区政策的整体吸引力、稳定性和兑现情况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分别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63.76%、65%和74.82%。

在自贸区简政放权方面，大多数企业对政府部门服务效率、办事透明度、企业注册成立的审批环节便捷度、自贸区对外投资手续办理便捷度、自贸区企业信息公示制度持正面评价，认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分别占85.23%、74.49%、85.23%、73.15%和85.23%。

企业对自贸区服务业开放及金融创新实施情况反映略显不理想，认为自贸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程度一般和不及其他地区的企业分别占调查总数的52.35%和19.46%，认为自贸区金融创新政策基本落地但业务开展受限，以及多数未落地、无法开展业务的企业分别占33.56%和16.78%。

（**据新华社自贸区扩区一周年调研组**）